
湖北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研究

朱爱琴^{1,2} 周勇^{*1,2} 陈君子^{1,2} 胡红兵³

(1. 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,

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;

2.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,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;

3. 黄冈师范学院 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, 中国湖北 黄冈 438000)

【摘要】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,运用空间分析法对湖北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进行研究。结果表明:

①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,主要集中在史前至先秦时期、明朝至近代以来这两个时间段之内。② 随着历史演进,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;移动方向呈现出先向南、再向东移动的趋势,与湖北省历史发展轨迹较为一致。③ 不同历史时期,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类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,均属于集聚型。④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逐渐由“多核聚散”演变为“一枝独秀”的发展模式,从以襄阳、荆州、鄂一黄为中心的聚散分布格局发展到以武汉为中心分布格局。

【关键词】 文化遗产; 时空演化; 文物保护单位; 湖北省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901

【文献标志码】 A

【文章编号】 1000 — 8462 (2016) 11 — 0184 — 08

DOI : 10.15957 / j.cnki.jjdl.2016.11.025

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,见证了一个国家、民族和地区历史的兴替,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历史时期社会变迁,有利于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资源.国内外学者对文化遗产的研究较为普通,从研究内容看,主要集中于文化遗产的保护^[1-4]、文化遗产开发利用^[5-8]、文化遗产价值评估^[9]、文化遗产法规建设^[10-12]、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^[13-15]、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分析^[16]、文

收稿时间: 2016 — 06 — 26 ; **修回时间:** 2016 — 10 — 16

基金项目: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(2015213) ; 湖北省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重点项目;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(CCNU16JCZX09)

作者简介: 朱爱琴 (1978 —), 女, 江西进贤人, 博士, 副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。E-mail: zhuaiq@mail.ccnu.edu.cn。

※通讯作者: 周勇 (1964 —), 男, 湖南益阳人, 博士, 教授, 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。E-mail: yzhou@mail.ccnu.edu.cn。

文化遗产档案管理^[17]、文化遗产产权^[18-19]、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^[20-25]等方面。总体而言，国内外学者较多地从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建筑学等角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，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文化遗产研究较少，且侧重于空间格局研究，对文化遗产的时空演化规律、影响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较少。

湖北省文化遗产资源较为丰富，类型较为齐全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。目前学术界对湖北省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较多，但多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开展研究^[26-27]。近年来，从地理学角度对湖北省文化遗产的研究已有涉及，如朱诚等分析了湖北旧石器至战国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^[28]。然而，已有研究对湖北省整个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时空演化规律、影响机理缺乏较为全面、系统的研究，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。作为不可移动文物，文物保护单位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，能反映文化遗产保护、发展的状况。鉴于此，本研究以湖北省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，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时空演化、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研究，以期为其保护与开发提供借鉴。

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

1.1 数据来源

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 (<http://www.nach.gov.cn>) 公布的 1—7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截止到 2015 年年底湖北省文物局 (<http://www.hbwj.com.cn>) 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本研究借助 Google Earth 获取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属性数据，运用 ArcGIS 10.0 建立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属性数据库，并绘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 (图 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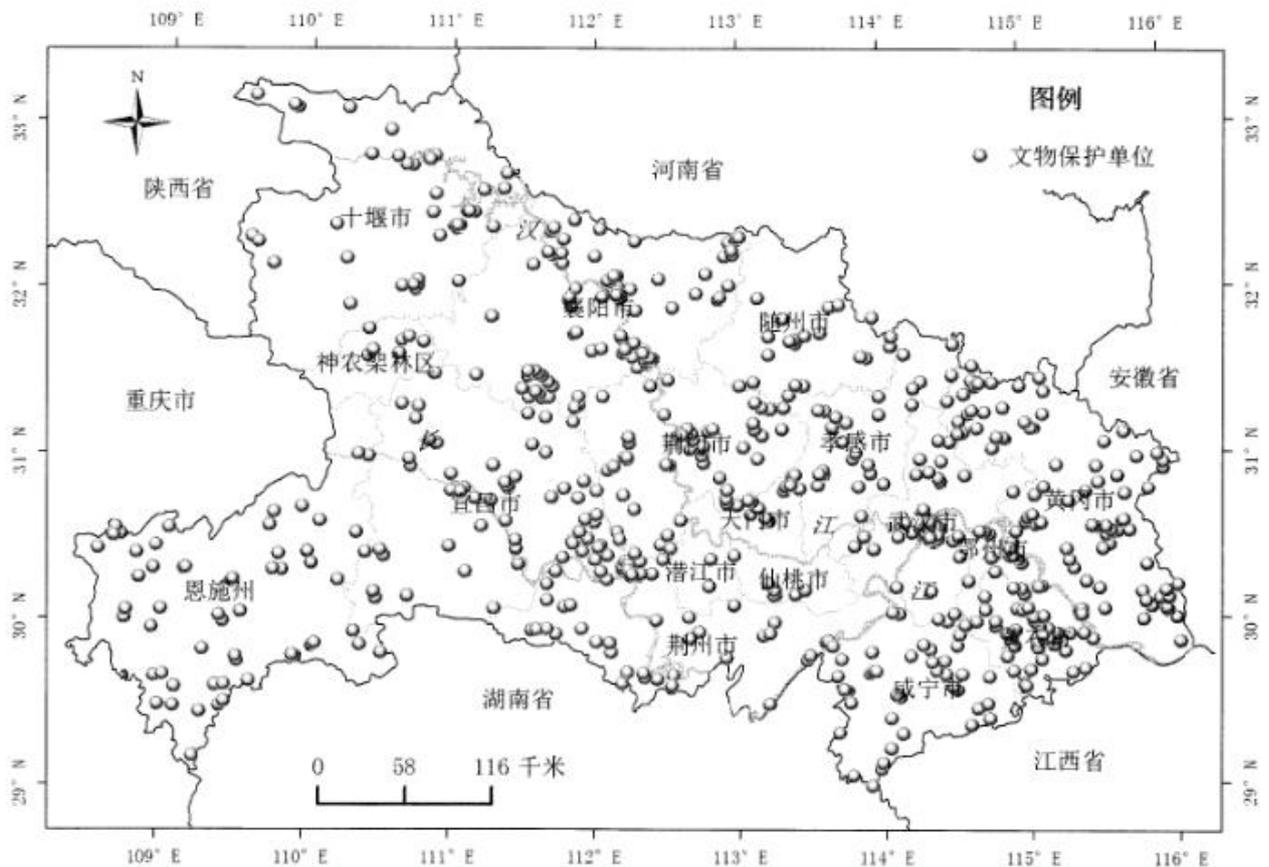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

Fig.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

1.2 研究方法

1.2.1 最邻近指数

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可分为集聚型、随机型和均匀型三种态势，最邻近指数可用来反映和刻画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^[29]，最邻近指数的计算公式为：

$$\bar{r}_E = \frac{1}{2\sqrt{n/A}} \quad (1)$$

$$R = \frac{\bar{r}_I}{\bar{r}_E} \quad (2)$$

式中：A 表示区域面积；n 为区域内的研究对象数； \bar{r}_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； \bar{r}_I 为空间实际最邻近距离；R 为最邻近指数。当 R = 1 时，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随机分布；当 R < 1 时，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集聚分布；当 R > 1 时，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均匀分布。

1.2.2 核密度估计法

通常用核密度估计法来研究规则区域中点的空间分布特征^[30]，其计算公式为：

$$\hat{\lambda}_h(s) = \sum_{i=1}^n \frac{3}{\pi h^4} \left(1 - \frac{(s-s_i)^2}{h^2} \right)^2 \quad (3)$$

式中：S 为待估计对象的位置； S_i 为落在以 S 为圆心、h 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的第 i 个估计对象的位置；h 的取值会影响到估计对象核密度值空间分布的平滑程度。

2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序变化特征

2.1 时序变化特征

为便于分析，将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史前时期、先秦时期、秦汉时期、魏晋南北朝时期、隋唐五代时期、宋元时期、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八个时间阶段。文物保护单位按其类型划分为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及石刻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其它等六大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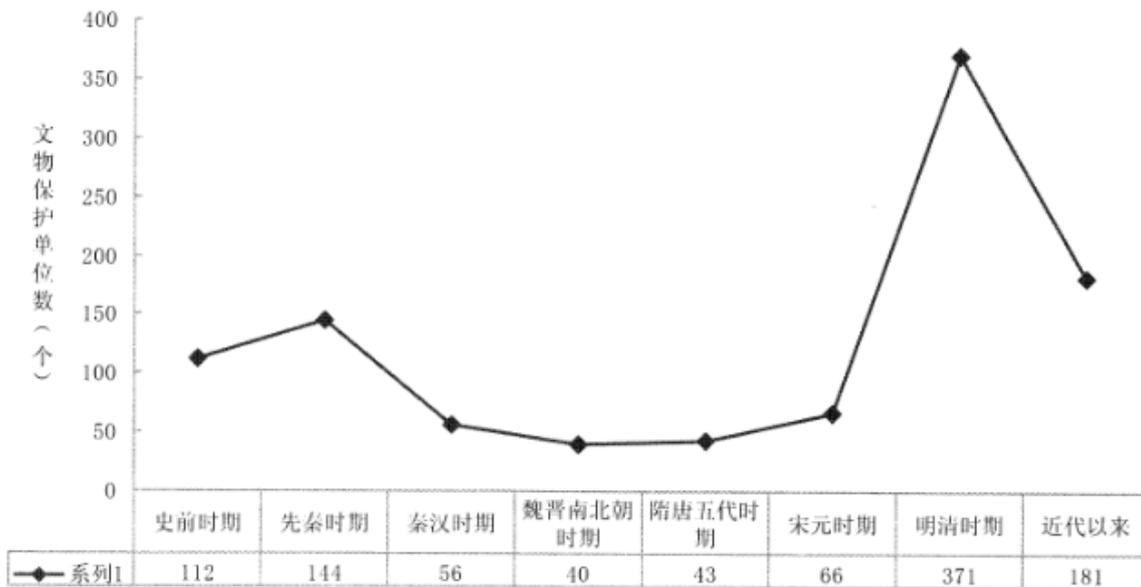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

Fig.2 The number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

如图 2 所示, 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, 各个历史时期均遗留有文物资源, 但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、明朝到民国这两个时间段之内, 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72.66%。总体而言, 越接近现代, 遗存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呈增多的趋势。

表 1 不同阶段湖北省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分布

Tab.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ubei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t different stages

不同阶段	古遗址	古墓葬	古建筑	石窟寺及石刻	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	其它	总计
史前时期	110(98.21%)					2(1.79%)	112
先秦时期	108(75%)	35(24.31%)	1(0.69%)				144
秦汉时期	32(57.14%)	23(41.07%)	1(1.79%)				56
魏晋南北朝	17(42.5%)	23(57.5%)					40
隋唐五代	12(27.91%)	20(46.51%)	7(16.28%)	4(9.3%)			43
宋元时期	8(12.12%)	15(22.73%)	30(45.45%)	13(19.7%)			66
明清时期	30(8.09%)	38(10.24%)	234(63.07%)	24(6.47%)	42(11.32%)	3(0.81%)	371
近代以来		1(0.55%)	10(5.52%)	2(1.1%)	168(92.82%)		181
总计	317	155	283	43	210	5	1013

注:有些文物经历多个朝代,如荆州三观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经历明和清两个时期,统计文物保护单位个数时,将该文物保护单位算作两个,以下类推。按照朝代统计,本文研究的文物保护单位总数是1013个。

如表 1 所示, 史前时期,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遗址为主。湖北省历史悠久, 史前时期就已有人类活动, 各种史前遗址较利于保存, 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址较为丰富。先秦时期,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, 此时, 湖北省是楚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, 遗留下来的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葬保存较为完好, 遗存的文物资源也较多。明朝至民国时期, 湖北省开发强度增强, 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, 尤其是近代以来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, 武汉曾成为区域性的政治、经济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埠, 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近现代重要史迹较多, 且人们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, 因而遗存的文物资源较为丰富。

2.2 重心演变趋势

对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分析,发现其空间分布重心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,移动方向呈现出先向南、再向东移动的趋势(图3)。宋元之前,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呈现出向南移动的趋势,其中,与秦汉时期相比,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70.68km,移动距离较大;宋元之后,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呈向东移动的趋势,其中,与明清时期相比,近代以来其分布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88.96km,移动距离最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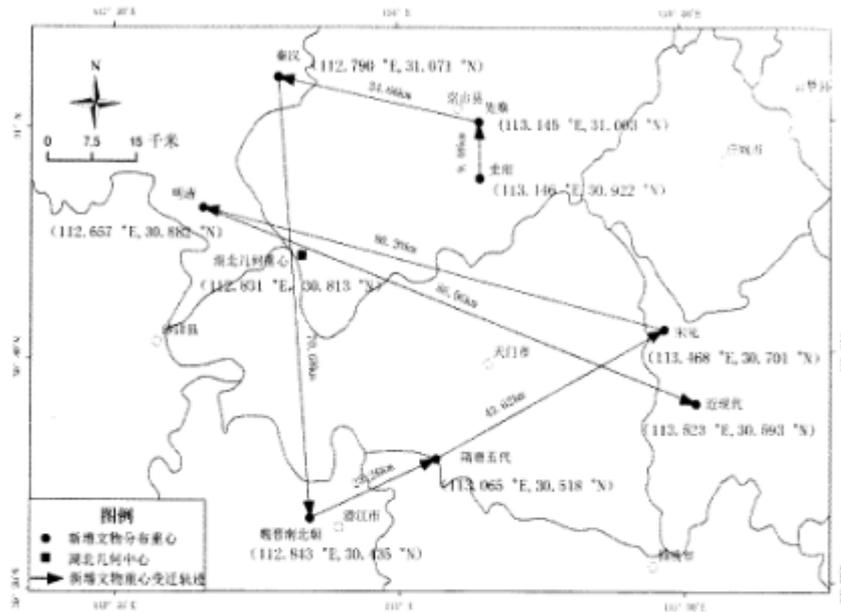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历史时期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变迁
Fig.3 Changes of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gravity of newly increased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in historical periods

宋元之前,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在荆襄走廊一带,襄阳、荆州是楚文化主要的活动区,也是北方人口南迁的主要迁入地,人类活动从襄阳逐渐向荆门、荆州一带迁移,相应地,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也呈现出向南移动的趋势。宋元时期,受北方战乱影响,人口多向东南方迁移,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也向东南方向迁移,鄂东一带得到开发;尤其是宋元之后,明清时期,武汉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升,而襄阳、荆州的地位相对削弱;近代以来,汉口的崛起使得武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与稳固,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也呈现出向东移动的趋势。

3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

3.1 史前时期空间分布特征

史前时期,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17.35km,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20.35km,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851 < 1$,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史前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,发现其

主要分布在荆门、襄阳、孝感、武汉等地，其中京山和大冶为其主要集聚区；恩施、神农架、宜昌、仙桃、潜江、咸宁等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较少（图4）。

史前时期，京山地区是三苗部落活动的主要范围，也是屈家岭文化以及后来的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区域，聚落发展迅速，保留至今的古遗址比较丰富；鄂东南地区的大冶、阳新、黄梅等地是古越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，遗留下来的史前遗迹比较丰富。史前时期，恩施、神农架、宜昌等地较为偏远，人类活动少；仙桃、潜江、咸宁等地多为云梦泽之地，人类活动强度较小，因此，这些地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址也相对较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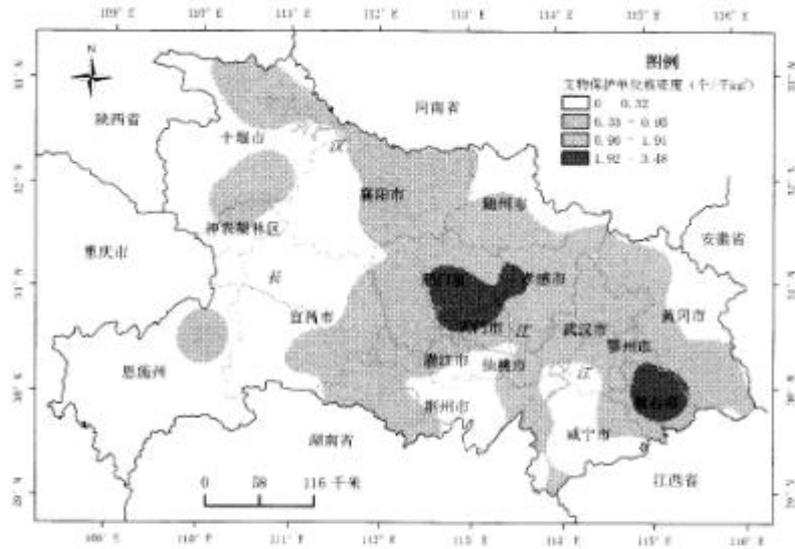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史前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4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prehistoric times

3.2 先秦时期空间分布特征

先秦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8.19km，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16.75km，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49 < 1$ 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先秦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，发现其空间分布有两个明显的集聚区，一是以南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集聚区，二是以大冶为中心的鄂东集聚区；十堰、孝感、武汉、咸宁、潜江等地分布较少，而恩施、神农架、天门、仙桃等地尚无分布（图5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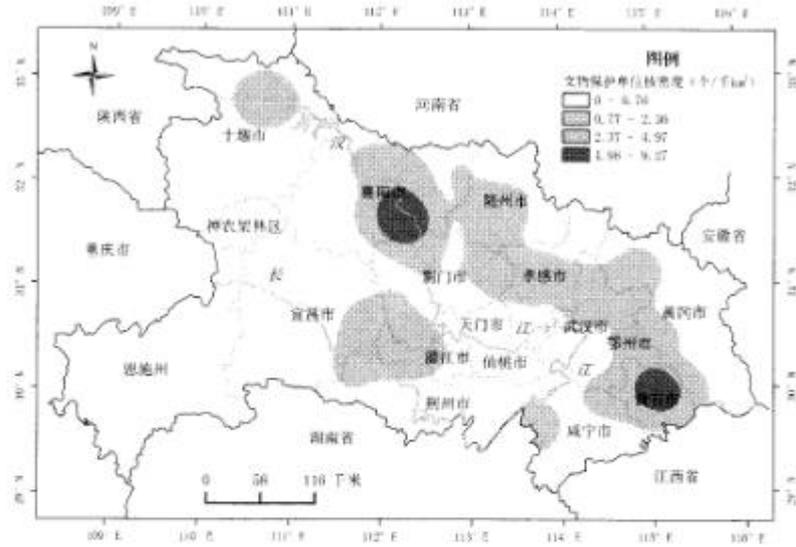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先秦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5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pre-Qin Dynasty

商代末年至战国这一历史时期，南漳、宜城等地是南方大国楚国的中心地区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较为发达，保留的历史遗迹颇为丰富；以大冶为中心的鄂东集聚区矿产资源丰富，遗存的矿物遗址较为丰富。楚武王末年，楚国由南漳迁都郢（纪南城），荆州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，至东周时期，呈仔都成为当时南方第一大城，因而遗留下来的楚墓葬、楚文化遗址较多。先秦时期，鄂西山区、鄂北地区、江汉平原大部分地区受地形地貌等的影响，人类活动较少，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源较少。

3.3 秦汉时期空间分布特征

秦汉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14.05km，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25.69km，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55 < 1$ 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秦汉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，发现其空间分布有荆州、襄阳两大集聚区，主要包括老河口、谷城、荆州市辖区、石首等地；神农架、恩施、荆门、孝感、咸宁等地分布较少，恩施尚无分布（图6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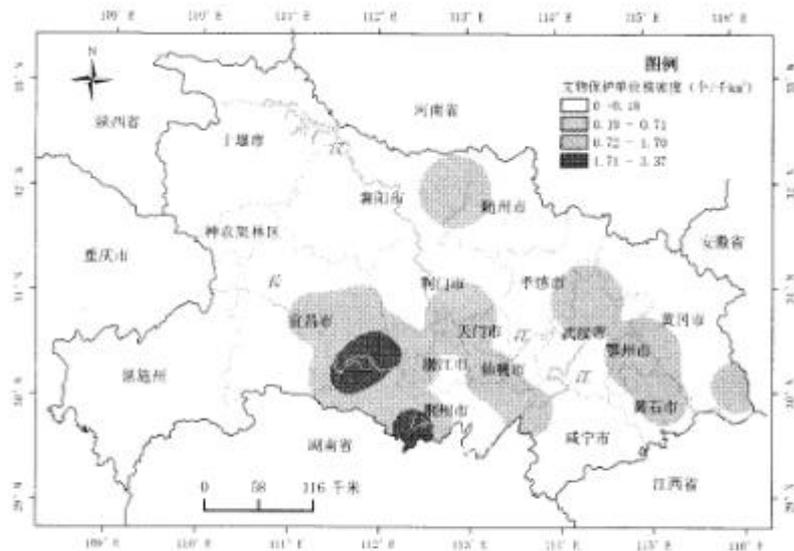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7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Wei, Jin,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荆州地处江汉平原，社会相对安定，是北方人口南迁的重要集聚地，其中江陵是主要集聚区之一；同时，部分巴蜀流民及当地人民顺长江而下，成批东迁，到达江陵地区。人口的不断迁入，使得经济社会水平大幅提升，荆州成为当时人类活动强度最大的地区。六朝时期，鄂州、黄石一带冶矿业发达，是湖北省的矿冶业集聚地；鄂州的造船业、兵器制造业发达，孙吴曾定都于此，商贸较为发达；因此，这些地区遗留下来的矿业遗址、古墓葬文物资源较为丰富。鄂西山区、鄂北山区等地，自然条件相对较差，交通不便，人类活动强度小，故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源稀少。

3.5 隋唐五代时期空间分布特征

隋唐五代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12.47km，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33.02km，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38 < 1$ 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隋唐五代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，发现其主要分布在荆州、黄冈、鄂州、黄石等地（图8），襄阳、神农架、恩施、荆门等地分布较少，咸宁、随州、十堰、孝感、潜江等地尚无分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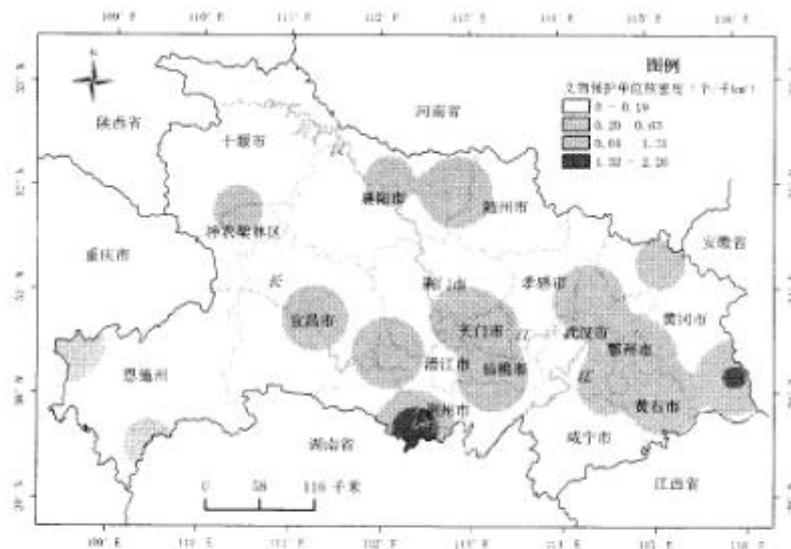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8 隋唐五代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8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Sui, Tang and Five Dynasties

隋唐五代时期，荆州地区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，商业发达，成为新兴的商业都市；荆州、襄州、鄂州是湖北省的三大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三大商业中心，江陵是货物运输和交换的集散地，襄州是南北贸易的枢纽地带，遗留下较多的古文化遗址。随着佛教在全国的盛行，佛教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尤其是江陵、鄂州、襄州、鄂州等地分布最为密集，遗留下来的石窟寺等佛教建筑文物资源比较丰富。鄂西山区位置偏远，交通不便，人口稀少，人类活动较少；唐后期，社会比较动荡，鄂东北地区是李希烈叛军寇掠之地，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，人口大幅下降，故这些地区遗存的文物资源较少。

3.6 宋元时期空间分布特征

宋元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17.50km，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29.57km，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59 < 1$ 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宋元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，发现其主要分布在黄冈、武汉、荆州、襄阳等地（图9），随州、孝感、恩施等地分布较少，潜江、仙桃、天门、神农架等地尚无分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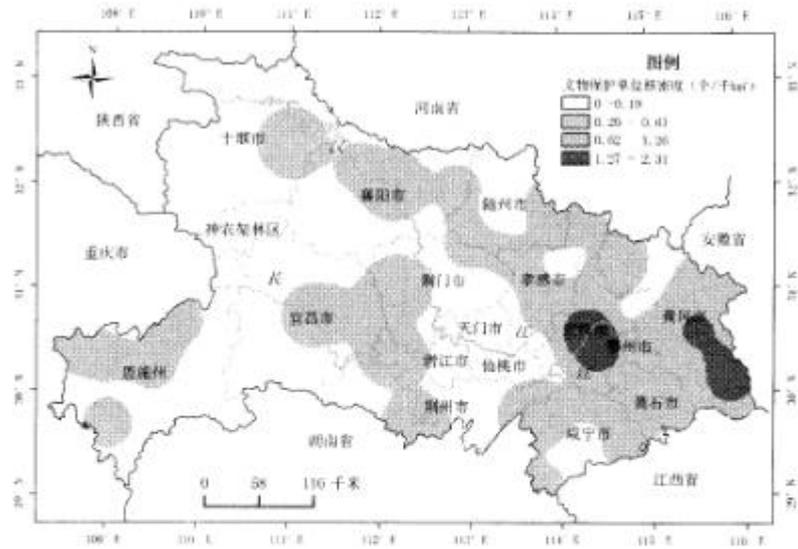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9 宋元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9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from Song to Yuan Dynasties

宋元时期，武昌、襄阳、荆州互相支援、互为呼应，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窗口与龙头；宋金对峙期间，江汉平原以及鄂东地区相对比较安定；即便是宋元战争期间，武汉、鄂州等鄂东一带在易手之际，基本上也是平静的。故而这些地区遗留下的古建筑、古墓葬文物资源比较丰富。鄂西山区位置偏远，交通不便，人口稀少，处于经济活动的边缘地区；潜江、仙桃、天门等地是当时洪涝灾害中心，因而这些地区遗留下的文物资源较少。

3.7 明清时期空间分布特征

明清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7.82km，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14.41 km，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54 < 1$ 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明清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，发现其存在三个较为明显的集聚区（图 10），即武汉、襄阳、荆山，主要分布在武汉市主城区、襄阳市市辖区以及荆山地区的南漳、远安；郧西、竹山、竹溪、随州、天门、仙桃、潜江等地分布较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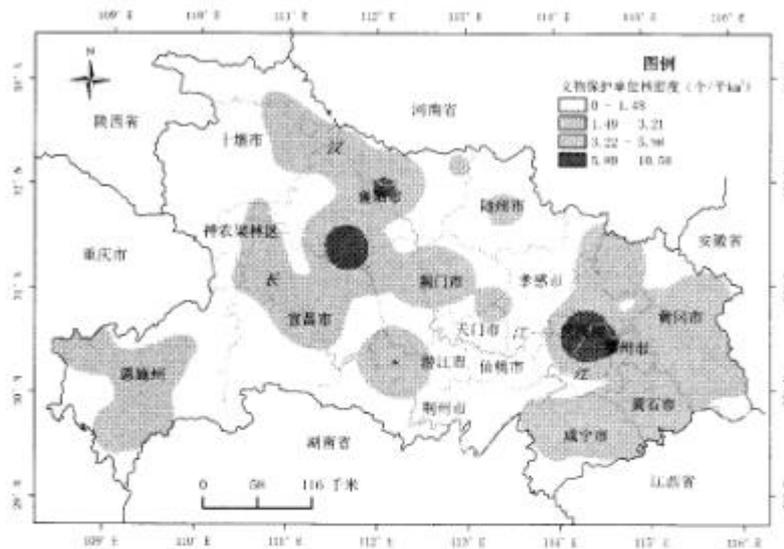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0 明清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10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ies

明清时期，汉口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便利的交通，经济社会发展较快，清中叶已发展成为全国性商业大市镇；武昌人口也相当稠密，商业也较为发达，是有名的造船中心；襄阳是鄂北重镇，水运交通和陆运交通发达；荆山地区凭借复杂的地形条件，在明清农民起义中是重要的根据地；荆州、宜昌是当时有名的商业都市，经济社会较为发达。因此，这些地区遗存的文物资源比较丰富，保留了较多的古建筑、重要史迹文化遗址。雍正时期，恩施地区实行改土归流，发展较为迅速；清中叶开始，从平原向鄂西和鄂西北山地的移民逐渐增加，鄂西山区不断得到开发，玉米、马铃薯等作物引入推动湖北山区的垦殖达到高潮时期，遗留下一些古建筑、古遗址等文物资源。郧西、竹山、竹溪、房县、巴东、五峰等地位于山区，交通不便，人类活动少；天门、仙桃、潜江等地是当时洪涝灾害中心。因而这些地区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源较少。

3.8 近代以来空间分布特征

近代以来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 r_1 为 9.85km，理论最邻近距离 r_E 为 18.0gkm，最邻近指数 R 为 $0.54 < 1$ 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。对近代以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，发现其集中在武汉市主城区（图 11），湖北省其他地区分布较少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汉口成为通商口岸，西方列强纷纷在汉口建立租界，西方现代建筑开始出现在武汉，并得到了快速的推广；洋务运动时期，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改革，其重点就在武汉地区，在此期间，政府积极创办轻重工业、编练新军、开办新式学堂；民国时期，武汉逐渐发展成为华中的商业、金融中心以及仅次于上海的全中国第二大商埠；抗日战争期间，武汉曾是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，沿海地区大量工厂一度纷纷迁往武汉；国人对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使得很多文物古迹免于战火损毁，故而武汉遗存下来的近现代重要史迹较多。相比武汉而言，湖北其他地区发展比较缓慢，遗留下来的近现代文物资源较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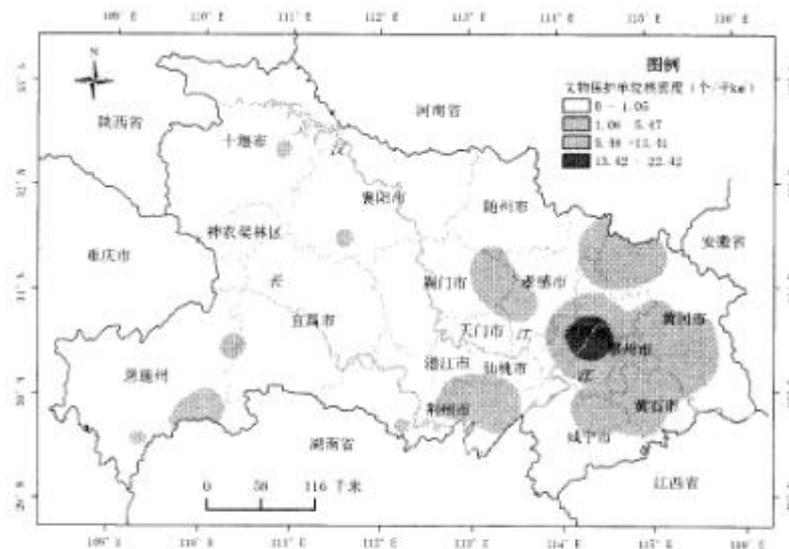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1 近代以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
Fig.11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ubei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modern times

4 研究结论与建议

4.1 结论

第一，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，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、明朝到民国这两个时间段之内，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72.66%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不利于保存的文物古迹多被损毁；伴随国人保护文物古迹意识的增强，越接近现代，遗留下来的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增多的趋势。

第二，总体来说，随着历史演进，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重心空间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，移动方向呈现出先向南、再向东移动的趋势，这与湖北省历史发展轨迹较为一致。宋元之前，襄阳、荆州是湖北省的中心城市，也是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主要集聚区；宋元之后，武汉逐渐发展成为湖北省的中心城市，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密集区。

第三，不同历史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类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，史前时期、先秦时期、秦汉时期、魏晋南北朝时期、隋唐五代时期、宋元时期、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，其空间分布的最临近指数 R 均小于 1，均呈集聚型的空间分布态势，反映出历史时期湖北省人类空间活动的集聚性。

第四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变逐渐由“多核聚散”演变为“一枝独秀”的发展模式。宋元以前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围绕襄阳、荆州、鄂一黄聚散的空间分布格局；宋元以后，鄂东沿江地区开发强度增大，特别是明清时期汉口的迅速崛起，武汉成为华中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以武汉为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。

第五，历史时期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多分布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，这些地区自然资源条件较好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，遗留下丰富的文物遗迹；受洪灾、战争等的影响，一些文物遭受到破坏，未能保存至今；随着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与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文物遗迹得以保存。

4.2 建议

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研究能揭示其历史发展规律，为其开发和保护提供合理的依据，其时空演化与其本身属性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区域发展政策、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相关，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。因此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，一方面，应进一步深入分析自然地理环境、自然灾害、人类活动等因素对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的影响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文化遗产本身文化属性的挖掘。文化遗产集聚区往往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地区，如何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，并将这些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协调文化遗产保护、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，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。

根据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规律，结合湖北省文物保护工作实际情况，研究认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保护过程中，可以制定相应的文物保护区划，遵循单体保护和片状保护相结合的理念，系统性地提出文物保护单位区划的具体方案；同时，需建立湖北省文物动态监督平台，充分发挥“湖北省文物管理信息系统”网络平台的监管作用，注重文物保护单位的数字化保护；此外，在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城镇区域，文物的保护需要结合地区旅游发展因地制宜地开展文化旅游，促进文物的活化，使文物资源在开发中得以保护，并在保护中带动开发；在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偏远地区，可结合当地发展水平，加大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；文物保护的关键在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，湖北省文物保护部门要注重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，切实提高社会群体对文物保护的意识，建立群众保护监督机制，使社会群众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。总体而言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需要将文物保护融入到地区发展中，促进地区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Isnen Fitri, Yahaya Ahmad, Faizah Ahmad. conservation of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Indonesia : A Review Current National Criteria for Assessing Heritage Value[J].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, 2015, 184 : 71 — 78 .
- [2] 戴其文, 刘俊杰, 吴玉鸣, 等. 基于区域视角探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[J].资源科学, 2013, 35 (5) : 1104 — 1112 .
- [3] 崔峰, 李明, 王思明.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——以江苏兴化垛田为例[J].中国人口·资源与环境, 2013, 23 (12) : 156 — 164 .
- [4] 杨丽霞, 喻学才.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述[J].旅游学刊, 2004, 19 (4) : 85 — 91 .
- [5] Eduard Madirov, Svetlana Absalyamova.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ultural Heritage[J].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, 2015, 188 : 255 — 258 .
- [6] 付晓东, 徐涵露. 文化遗产的深度开发——以安阳殷墟世界遗产开发为例[J].中国软科学, 2014 (7) : 92 — 104 .
- [7] 李玺, 毛蕾.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的创新性开发策略研究——游客感知的视角[J].旅游学刊, 2009, 24 (8) : 53 — 57 .
- [8] 宋振春, 朱冠梅. 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研究——以曲阜为例[J].旅游学刊, 2007, 22 (5) : 54 — 60 .

-
- [9] Vasile Valentina , Surugiu Marius-Rzvan , Login Ioana-Alexandra , Andreea Stroe . Innovative Valuing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ssets . Economic Implication on Local Employability , Small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[J].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, 2015 , 188 : 16 — 26 .
- [10] Tess Davis. From Babylon to Baghdad :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Republic of Iraq [J].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, 2014 , 21 (4) : 445 — 463 .
- [11] 徐辉鸿, 郭富青.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法保护模式的构建[J].法学, 2007 (9) : 94 — 101 .
- [12] 叶秋华, 孔德超. 论法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[J].中国人民大学学报, 2011 (2) : 10 — 19 .
- [13] Elidiana Bashi . Cultural Heritage of Albania-A Fabulous Economic Source for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ourism [J].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, 2015 , 188 , 89 — 94 .
- [14] 宋立中, 谭申. 复合型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路径分析——以福建马尾船政文化为例[J].旅游学刊, 2012 , 27 (10) : 93 — 101 .
- [15] 孙业红, 成升魁, 钟林生, 等.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潜力评价——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[J].资源科学, 2010 , 32 (6) : 1026 — 1034 .
- [16] Aisyah Abu Bakar , Mariana Mohamed Osman , Syahriah Bachok , Mansor Ibrahim . Analysis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Level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: Malacca Cultural Community[J].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, 2014 , 153 : 286 — 297 .
- [17] 吴品才, 储蕾.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理论基础[J].档案学通讯, 2012 (5) : 75 — 77 .
- [18] 王云霞. 论文化遗产权[J].中国人民大学学报, 2011 (2) : 20 — 27 .
- [19] 王莉霞, 陈荣婕, 许中媛.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进展[J].人文地理, 2009 , 24 (5) : 7 — 12 .
- [20] Junjira Nunta , Nopadon Sahachaisaeree . Determinant of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Spatial Setting of Cultural Landscape : a Case Study o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Thailand [J].Procedia-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, 2010 (5) : 1 241 — 1 245 .
- [21] 余中元. 我国文物旅游资源的时空特征及保护开发策略[J].经济地理, 2011 , 31 (2) : 312 — 316 .
- [22] 程乾, 凌素培.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[J].地理科学, 2013 , 33 (10) : 1166 — 1170 .
- [23] 奚雪松, 许立言, 陈义勇. 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[J].人文地理, 2013 , 28 (1) : 75 — 79 .
- [24] 梁勇, 闵庆文, 成升魁. 世界葡萄园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分析[J].中国生态农业学报, 2012 , 20 (6) : 693 — 697 .

-
- [25] 吴清, 李细归, 张明.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[J]. 经济地理, 2015, 35 (6) : 175 — 183 .
- [26] 袁永明, 张治强. 湖北丹江口市莲花池墓地战国秦汉墓[J]. 考古, 2011 (4) : 26 — 46 .
- [27] 郭佳. 湖北地区古墓葬的主要特点[J]. 考古, 1959 (11) : 622 - 624 , 651 — 652 .
- [28] 朱诚, 钟宜顺, 郑朝贵, 等. 湖北旧石器至战国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[J]. 地理学报, 2007 (3) : 227 — 242 .
- [29] 张超, 杨秉赓. 计量地理学基础[M]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 1991 .
- [30] 王远飞, 何洪林.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[M]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07 .